

论文学本体的生命有机性^{*}

赵建军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文学的生命本体是文学存在的物化形式,还是物化外壳下别有孕育的生命?中西文学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追问莫衷一是。文学的物化形式可谓之诗语言,在前文学“婴儿期”以静默方式蕴蓄诗的潜能及其有机性,若无诗的“发声”,文学终归无所凭依。然而诗语言又并非文学的生命归依。自从诗诞生以来,形象、情感、事件、图像、身体等纷纷登场,借助语言而存在却又顽强地排斥语言的在场感,其极限化的表征就是数字化时代的文学已经很少或不再对语言精雕细琢,那么决定文学生命根基的本体究竟是什么,便成为文学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文学的本体显现为诗语言呈现的完整生命序列,诗语言呈现的前与后承载着诗的在场与退场的奥秘,其生命本体伴随着诗语言的呈现产生内在的变异。言、意、象、像诸变因的在场比重与文学构成的逻辑相位呈反比态势,从而数字化时代的文学可以实现披一而挂万,巧妙将文学的后续生命成因导入宽幅的生命场域,改写文学传统的诗语承载方式为更切近客体的诗语激发,诗语言的完整生命也由外在物化表征的逐渐衰减转换为主体的受孕性变异与更新。

关键词:文学;生命本体;诗语言;生命变异;生命场域

在线杂志: <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 I0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8)01-0124-09

作者简介:赵建军,男,博士,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引用本文:赵建军.论文学本体的生命有机性[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1):124-132.

一、文学的生命有机性概念

从文学存在的根本特性考虑,诗语言呈现不是文学的本体。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1]94} 鲁迅描述的“杭育杭育派”形容了一种劳动的场面,并没有也不能解决诗的本体问题。文学的本体与呈现有关,

发表或出版意味着存在方式的变化,这种呈现某种意义上与文学的本质有关联,如口头或书面发表方式,间接反映了文学的影响方式和表达特点,但很难将它视为文学存在的本体。文学语言采取散文或韵文形式表现,类同书面文学与电子文学等,不论其效果如何,都属于文学(诗)语言的呈现方式。

诗语言呈现是诗的出场,是诗的着装或庄重或华丽或奇诡或简素的表演。在诗出场以前,诗的生命有一个类似“婴儿”的静默期。“婴儿”的静默期是生命有机性的哺育期,即不仅从母体吸取体能所需要的营养,也吸收感受、想象和情感的滋养,逐步获取智慧和理性,接收、处理外界信息使生命有机体健康成长。大约在新石器文化时期,中国文学进

^{*} 收稿日期:2017-05-17

人到“婴儿”静默期储积了大量的图腾想象。那些图腾想象有的诉诸于口语,但更多的不能表达,因为人类还不知道怎样说话,包括“杭育杭育派”、《弹歌》以及“葛天氏之乐”之类的咏唱,都不算真正的诗文学表达。虽如此,中国文学在婴儿静默期汲取到的滋养,对于以后文学的生命有机性十分重要。首先,巫术生活被纳入到文学里面,提供了族群生活的图景和观念,巫术的祭祀和劳动、生殖、战争、狩猎、贸易等生活内容,反映了原始时期中国人的“诗性智慧”,它们成为文学生命形成的基础和前提;其次,商末周初时期,“卦象”思维系统被吸收到了文学里面,培育了中国人对“象”的直观能力和与此相关的感知、悟化等诗化观念,这从《山海经》有关神话和《诗经》里的史诗可以得到证明,反映了文学开始有了整体性的生命构成内容。再者,书面语言逐渐成熟起来,赋予了诗以“诗教”的生命存在形态。《尚书·尧典》曰:“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话写的就是诗教,“神人以和”和对“诗、歌、声、律”的认识,“诗言志”的命题,都是文学意识到自身生命存在性的反映。而以诗教形式存在的中国文学,则标志着诗作为社会有机体构成了具有独立而合法的存在身份。

“诗言志”对于文学存在的生命有机性,强化了诗语言与心志内容的有机统一,这是一大进步。有机性,从科学观点来看,指一个由基因(genes)组合的复杂系统。文学的生命基因,包括自然、社会及其他使文学成为生命统一体的对象或成分。在诗语言未呈现之前,诗的自然基因潜在于人的生命本能活动中,当口头或书面语产生以后,诗将社会性基因纳入到自身机体之中,这时的文学不再是自然(本能)的发声,而是融聚了人生命运与社会兴衰的情感化、形象化的存在体,其生命存在“基因的代代绵延传递里将蕴藏有人类的文明传承机制”^{[2]7},自此,社会性基因成为决定文学生命存在与变化的主因。但是,这种生命基因的展开和变异,既是一种生命体的成长,也是一种基因结构的破裂,在诗的自然生命机制遭遇到破坏时,社会机制挤进来主导并控制文学的存在,其中最有力的因素是政治和伦理原则,每当用它们裁定文学时,文学自然活力就大为衰减,社会规范的文学循着社会序列的轨道生长。孔子用社会化伦理裁定诗的存在,在自然有机性之外重塑了社会教化的有机性。对此类,老子曾

感慨地通过呼吁“婴儿”期复归,来赞美诗生命的本真状态,认为以“无为”为诗,“行不言之教”^{[3]112},“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诗最显生命有机性的原生妙合状态。

诗的生命有机性的拓展和变异,使诗打破了静默状态的原始生命有机性,走向依托诗语言呈现的有机性分化路线,出现一种为诗语言呈现受外在内容规约,从而呈现的是社会化生命有机性的诗语言;另一种为诗语言与生命有机性内在相通,从而自然简约是诗语言呈现的最高境界。打破生命的默契与回归到诗生命本体的静默,在诗的生命有机性上,并无根本的矛盾,文学或诗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凸显生命存在的自然意趣和本真情思,而这种诗语言的呈现,在社会伦理或政治的强硬规约是无法实现的。中国文学从其走出原始婴儿“静默”期开始,就内在拥有不同的生命有机性追求,从而对古代诗与文学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二、文学有机性的现代裂变

诗语言呈现使诗成为诗。诗语言呈现对于文学实现在场性和话语身份权,是一必要条件,但诗语言呈现并非诗之本体,诸如“诗言志”、“诗缘情”等命题都没有把诗语言视为本体。这意味着,诗语言相对于所表现内容,似乎不是最重要的,人们更关注诗语言呈现了什么,文学本体也依此而将诗语言呈现的幅度、能量等视为文学本体展开的生命极致。当诗语言呈现被作为文学本体的传达形式来理解时,它与本体就不构成对应关系,而是存在与功能的统一问题。自古以来,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使得文学生命的有机性沿着本体内涵与功能表现的两极演绎发展,越来越复杂,一方面,文学本体有其外在的目的,它通过自身在文学实践中的效果检验与测定,不断地寻求文学本体内核的生命变革,产生一次次的本体裂变;另一方面,诗语言的呈现也不满足于对本体内涵的被动响应,它也探求自身脱离本体的规约与限制,来获得独立的生命存在形式,也从自身需求出发产生一次次变异。两方面协合起来,便导致文学整体存在自古及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农业文明背景下文学本体意蕴的这种破裂或变异,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裂变的反映。所谓现代性,是一种以理性方式对已有普遍规则或价值的反思和批判。在农业文明时代,文学现代性的破裂,

表现为文学的理性思考以诗语言对新的普遍性和规范性的遵守,颠覆了已有的普遍价值尺度,致使文学的普遍规约在内涵和外延上形成拓展,但总体的目标仍然倾向于弥合普遍价值或规范的缺憾,文学的生命本体仍然依托这种普遍价值显示其完满存在。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学现代性破裂,不同于工业时代文学的现代性破裂,后者以对工具理性的确立颠覆抽象理性的完满,体现到文学上是大量悖谬性的生活事实对普遍规范形成冲击,文学在切近生活和大众的过程中,依托于现实体验生成新的文学审美规范。现代性的破裂有破坏也有建设,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性破裂在世界文学中非常典型,因为它自始就从对普遍的文学命题的反思与颠覆开始,不断在颠覆已有的文学规范中推进文学存在的生命有机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学的本体是最具理性反思与批判的矛盾和张力的,通过对旧的普遍尺度的反思和批判,中国文学的生命有机性实现了空前的拓展,诗性表现空间一次次完成向更高尺度的境遇的转换。必须肯定,中国古代文学生命的有机性虽然在破裂中,不断超越了旧的普遍观念,却在总体上并没有脱离理性反思与价值理想化的预设尺度,从而在不同的生命有机性转换过程中,生命本体的构成要素一直基于总体理想化的设定保持其生命质性的绵延,使得转换中实现的文学生命要素,每一次都获得了充分的诗语言呈现。

古典时期中国文学的生命有机性破裂,源自文学深层观念的一次次颠覆。这种颠覆从对文学诗语言呈现的标准的反思开始,以表现出新的原则或本体内核为标志,显示文学本体观念的内在推进和对原有有机性的某种程度的破坏和展开,因而才是破裂性的文学革命运动。但由于诗语言与本体内核的关系始终没有改变,对本体内核的思想推动与诗语言呈现的技法、手段的变化呈现出历史的连贯与对应,我们说古典时期中国文学本体的现代性破裂,是一种始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对立,而在不断否定、批判或弥补已有理想化标准中,又提出新的理想化标准的一种价值理性推进,它在破裂中有保留,批判中有肯定,否定中有传承,是切切实实反映了农业文明思想认知与情感体验高位反思的历史传统。因此,有必要具体对中国古典时期文学生命有机性的内在推进及其破裂性增益的方面,给予阐释和揭示。

诗语言呈现标准的最早一次破裂来自对周代以来诗教观念的突破。屈原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诗

人,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位以个体性情的抒发,突破和超越了周代诗教礼乐标准的诗人。“诗言志”的“志”后人作为古代文论的解释,为“心之所志”,即思想感情,但联系《尚书·尧典》中的上一句及“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连贯解释,则“志”为节制性情的内在标准,它与孔子删诗的价值尺度是统一的。屈原的诗抒写内心的愤懑、牢骚、感慨和志向,使主体精神得到充沛淋漓的表达,其诗作的语言也完全超越了对客观景致或主观情思的直接书写,以比喻、象征的艺术手法和缀合神话、想象的修辞手段,展示出情感奔放恣肆、想象瑰丽奇特、语言富赡多彩、韵律抑扬饱满的特点,开辟了中国文学个体创作的先河,可以说直接对周代以来文学的深层观念造成冲击,导致其破裂。此后中国文学对个体性情的抒写,虽有儒学诗教道统对伦理规范的一再强调,如汉代《诗大序》明确要求诗要“心发乎情,止乎礼义”,但个体性情的本真表现,通过屈原已成为文学的本体内核和重心所在,从而后来杰出诗文创作者都秉承这一创作原则,更有陆机提出“诗缘情”观念,将主体真性情的抒写在理论上推崇到极致。

继“诗言志”、“诗缘情”观念的逻辑相次推进,文学或诗表现的“形似”、“意象”、“意境”观念相继涌入文学历程,成为文学本体生命逻辑实现更深一层掘进的对象和内容。诗语言以“形象”为表现目标,在汉代、魏晋南北朝及随唐时有显著表现,是从主体性情转向外在景象、氛围并注重诗化呈现的一种演变。中国文学中的“形象”,不是西方那种从对象出发注重语言逻辑化铺叙所写出的形象,而是在主体的情意驱遣下实现的逻辑推进,是一种相对性质的逻辑重心,因此,汉赋铺彩摛文,重在“形似”与“形”之“势”,魏晋南北朝也有“形似”和“神似”比较之说。就实际的文学创作而言,确曾有过注重“形似”的生命周期,如刘琨诗写山与谷中景:“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谢灵运写池塘静态:“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鲍照写桃兰姿态:“风轻桃欲开,露重兰未胜”;杜甫诗写动物形态:“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皆传形象特点,且重点刻绘,如雕如镂。但“形似”观念毕竟为“似”,未尝着意于“形”的铺叙,因而“形似”观念成为“神似”的基础,且很快转入“意象”和“意境”观念。大体以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在“意象”、“意境”观念的诗语言呈现上形成渐臻完满的突进,表明每一次对诗语言表现域的突破和展开,都是原有

文学本体观念的一次破裂,同时也是对诗生长过程趋向完满的生命有机性的弥合与增益。比较之下,“意象”更着意于主体意念浸染后的诗化呈现,因而“意象”可随主体情意之开阖,驰骋时空之广际,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于此有精到的总结。但意象终归为依托于主体情意的线性诗化转换,它所呈现的意象往往是“单义”喻象的排列,或整体氛围中诸个景象的烘托,本身系于意却并无深意寄寓,皮肉有分离感。因而,意象必向意境的诗语言呈现发展。意境的诗本体也为基于“意”的“二重诗化呈现”,它离开直接铺叙和直抒胸臆更远,是主体精神的一种诗化审美境界。唐诗、宋词多意境精美之作,但意境的诗化重心也有较大不同,唐代以主体情想象化境界的二重创造为其极致,宋词则以主体情思的体验化境界偏胜。因意境的诗语言呈现,呈现出诗化境界的独立审美氛围和趣味,因而诗本体的生命有机性对此前诸文学本体观念的传承与弥合,也在诗语言的精雕细镂或朴素工致方面,达到某种极致。以致晚唐和南宋对意象和意境的诗化传达,已经很难从“象”、“境”的创造方面突破已有的创获,故而标举“象外之象”、“境外之旨”、“味外之味”等,力使主体之意的诗语言呈现缥缈超拔,幽妙难寻。这意味着,文学本体基于主体情志的原点,由普遍性伦理规范蜕变而起,进而形成的一次次裂变与弥合的逻辑观念,正趋向它逻辑成熟的终点,而这个结果最终在明清之际,以沦为边缘化境遇的姿态,在王国维所总结的“境界”概念里,寻到它的归宿。诗或文学的“境界”,是一超越了具体的形、象、意而穿入到诗化精神品位的概念。诗的境界,可以在“形象”、“意象”、“意境”诸方面表现上成立,但必是造化之工,令人有独览诗之绝境之感。若此,则“境界”的逻辑内涵更多为文学本体的评判,它或是对文学本体诗化理想的绝对性描述,是古典现代性对生命本体内在匮乏性的又一次总体审视,但普遍性的价值理性在新概念的设定中,似变得缺少之前生命本体的内在活力,也缺少生命有机性的拓展底蕴,因而,自境界概念提出后,古典时期文学本体的生命有机性也宣告了它的逻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近现代文学本体的更新与建设。

三、断裂与复活的当代变奏

近现代文学本体的建设是又一种生命本体的建设,它不是建立在古典理想化生命有机性的反思

性预设上,也不以精神内涵的抽象性表达为其极致,而是立足于市民社会生成的生活观念和经验之上,形成了对人生、命运及社会矛盾真实呈现的系统文学观念。

这种新的文学本体带有更鲜明的感性特征,它不再以诗为主导类型,戏剧、小说乃至进入20世纪以后电影文学的应用而生,都成为文学新本体观念的主要表达类型。那么,中国文学在近现代所建立的新本体观念究竟具有哪些新的特点,它与古典的诗类型为主的文学本体观念存在哪些不同呢?

首先,近现代文学本体以现实理性的反思呈现文学生命有机性,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市民社会、商业文明,在近现代国际大文化圈里,也早已融入西方工业化文明的现代性元素,这进一步使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理性省思带有工具理性的特点,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运动形成十分紧密的互动。从元戏剧对人生悲喜剧状态和历史的道德反思,到明清小说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社会政治的无情批判,都塑造了丰富的具有现实情感和鲜明个性的系列人物形象,尤其表现和歌颂了英雄性格和反抗精神;从五四新文学的“白话文”革命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人生理想与现实批判,从30年代的救亡到40年代的大众小说,都熔铸了饱满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激情,表达了鲜明的时代个性;再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这个期间的文学命运来看,文学的生命有机性也是浮沉于现实的政治和文化风浪中,不失时机地表现有自身的话语表情。总之,我们甚至可以对明清时期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文学,特别是体现于戏剧、小说里的叙述口吻和人物语言进行“标记号”检索,把它们按照时代、社会的价值职能进行归类,会发现它们自然地形成时间上的时代区隔,文学与现实生活和政治文化运动形成如此近距离的联系,这是古典时期的文学呈现,尤其是诗语言呈现所不具备的。

其次,近现代文学本体表现出鲜明的不断“重起炉灶”的建设特点,这种状况使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在整体生命有机性的表达方面难以形成内在一致的前后绵延的逻辑联系,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由新本体、新基础起步,以致近百年来虽然作品颇丰,也不乏佳作,但是就是缺少生命本体沿贯累积的宏大之作,这与这百年来的时代文化背景的发展并不是十分相称。我们说近现代文学的“重起炉灶”,是指文学本体,或文学生命有机性的那种根本建设,体现于文学发展的实际,元明以来戏剧、小说

的文学本体观念相对于古典主义理想化的诗本体观念,是不在一条线上的,虽然元杂剧与之前的诸宫调、金院本有相承关系,明清小说也与宋以来的话本有直接的联系,但包括之前的诸宫调和话本都是前近代商业文明和市民社会的产物,因此它所代表的文学生命本体是截然不同于诗类型的本体观念的;至于 20 世纪以来的文学本体变革,更是一再重新奠基,屡屡新筑机体,大体说来,“五四”至 30 年代的文学,是在“白话文”新文学本体观念驱使下发展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生命机体,它不同于传统文学,也与近代文言文的现实主义呈现不同,是具有现代内在精蕴,又汲取了世界文化和文明意识的新的文学创造,因而它所展现的生命有机性与旧的基础并不是合缝对接的,而是断裂新起的。20 年代末的“太阳社”、抗日战争时期的大众化文学和 50、60 年代的文学,所遵循的文学本体原则,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学观念,它有自身系统的观念,主张创造典型形象,反映历史真实,让文学在真实揭示历史与现实的本质方面产生其价值。革命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及其文学语言的诗化呈现,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方面的时代联系和文体、表达特征方面的联系,但就文学作为生命有机体的独立存在及其生命个性而言,它们所借以确立自身存在的本体观念是根本不同的。“五四”新文学可以描写苦难,也可以容纳小资情调和闲适优雅的文学情调,而革命文学对这些却是内在地排斥的,革命文学把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具有时代特征的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当作根本的目的,并且在文学形式的择取方面,也体现阶级意识,认为文学的一切形式,都具有阶级倾向性,审美趣味有先进和落后之判,反动的文学总是采取消极的生命态度和朦胧、暧昧、晦涩的表达形式。革命文学观念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文学的一种主要浪潮,虽然对于革命文学的具体作品可以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甚至对之反映现实的深刻性和与大众联系的广泛性、形式表达的生动性,可以形成充分肯定的判断,但这些都与文学生命本体问题的思考、判断不在同一逻辑层面,因此,将革命文学视为独具特征的、一种新生的文学生命有机体,是非常恰当的。

至此,我们还可以对其他的文学本体做出界定,特别是新时期的文学,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注重本体观念对文学生命、文学存在的根本变革作用,在寻到不同的文学思想资源时便采取相应的本体意识,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文学超越了

之前的政治文学本体观念和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的现实主义反映论观念,开始了文学本体观念的不同试验,从 80 年代中叶的文化本体、性本体、生命意志本体文学,到被谓之“先锋文学”的形式主义文体观念的提出,以及 90 年代初“新现实主义”的文学生存本体观念、90 年代中后期的民族文学本体观念等,多立足于用西方话语来改造中国文学话语,各本体观念之间常以解构对方为存在之前提,至于本土文化、本土文化的生命本体观念,早已经处于层层断裂的视域之外了。

必须深刻地确认这种文学本体观念的断裂现象。尽管民族生活、文学语言和接受的对象都对文学本体的选择产生某种限制,甚至每一种文学本体观念提出时也都大谈特谈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思想资源,但实际上所呈现的却是西方文学本体观念的断裂性移植,不仅与中国传统的文学本体观念不能形成生命有机性的对接,即使那些逐一登场的移植西方的文学本体观念之间,也根本不具有共生相融的基础,而是内在地有一种对立、消解意识渗透在他们身上,所以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后叶的文学,可以说是文学实验的大竞技场表演,由于各种本体观念的基础不同,不能形成有机交融,从而并没有产生恢弘的力作,至于具备国际性、能够对人类文化产生有力影响的作品,更是根本不用议的。

文学本体在近现代的断裂,是文学面对各种矛盾试图以文学的方式给予回应或解决,从而形成了“破大于立”的一次次生命有机性的断裂。与农业文明背景下的目的性理想的现代性反思所形成的本体破裂不同,那是在连续性的扩张中对生命本体的缺憾或不足的弥补,期望有更饱满的生命完成生命本体具有同一性的终极预设,而近现代的文学生命本体则并非理想化的和绝对性的,它始终面对着现实经验或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伦理等问题,试图以文学能量的激发介入整个现实的改变。因此,就文学作品的思想容量而言,近现代文学的生命本体更有深度和广度,但也更为庞杂和多元,它反映了文学生命的紧张状态,它的本体构想也含有缓解这种紧张的意图,但因为基于很现实的目的而为,每一种本体对生命整体的作用最终都不免是修饰性的,并不能建立起完整健全的生命有机性。因此,近现代文学并没有体现出成熟的生命本体观,只不过表达了文学成长状态葱郁蓬勃的生命意识,这些无疑对于建立未来文学的生命机制是极具参考价

值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它所打破的一个又一个文学的生命基础,使文学生命有机性呈现出杂乱无序的变异,都对文学本体的生命逻辑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以致于文学发展到后来,其身份意识和话语表现力越来越尴尬,文学似乎越来越难以维持自身统一的有机性,而不得不在断裂的碎片基础上,将自身分解为不同现实功利和文化使命的组成因子,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话语危机和价值危机,其最严重的情况是,人们甚至觉得文学本体是否有必要追问,也成了问题,文学应该怎样发展博取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话语表现的生命有机性,真正成为当前的首务之一。

四、文学有机性的“数字化”变异

在数字化时代,中国文学的生命本体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基因变异。在以往的本体变异中,诗语言作为文学物化形式的一个存在前提,即使不被理解为本体构成的对象或内容,它也承担有呈现本体内核的使命,也就是说,诗语言也是文学生命有机性的一个必要因素和条件,它属于构成性的文学生命本体观的组件之一,而关于文学自身的生命有机性,它的思想、情感、想象和用来编织这些情感和想象的人物、事件、生活场景和心理体验等,都是文学本体不可或缺的东西。而在数字化背景下,传统文学所借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因素都不再是首要的或必要的,甚或说是前提性的,文学本体问题,在数字化时代已由传统的重视文学对象和诗语言呈现及由此对呈现效果进行预设,改变为对呈现后的种种可能性进行推演,对文学的思想、情节、意图和想象因素,以及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呈现后会获得怎样的“综合价值”进行逻辑掌控,进而文学的本体,文学的生命有机性不再为单一目标的预设,不再是先知性的,而是以后验性的跟进予以回答的内容。这样便意味着文学的生命本体,文学的生命有机性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异,对文学审视的尺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也从新的本体观得到其诠释和确定。

数字化时代的“网络文学”概念,有其特定的指谓,指依托于网络实现生产、阅读、传播和审美效应的作品,它显然是数字化时代文学的主导形式之一,但不是全部,数字化时代的文学既包括网络文学,也包括不完全依赖网络,但充分利用了数字化手段实现了生产和传播的作品,这些作品最终的形

式可能也采取传统纸质形式,但因为自始处于广告、网络信息的包裹和评论、解读、改编、商业化利用的跟进中,已经不再是传统作品面世时“嫣然一笑”便“约定终身”的存在形态,它在生产前和生产后,都把作者和读者带进了它的生存氛围里,并通过社会性的互动,使文学更现实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之中。

标志数字化时代文学本体性质和生命特征的根本方面是,诗语言的呈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消解。传统文学虽然可以在本体观念的推进中,不断通过“形象”、“意象”、“意境”的内在变异,使文学价值和历史使命以自我突破的方式赢得高位实现,仿佛生命机体的适应性是对生命极致的探寻,诗语言是通达极致的血液和脉络,把生命所需的构件和能量紧紧粘连一体,而现在语言在文学中的作用,仅仅是媒介性的存在,它自身与对象、内容的关联并不是必要性的,作家写作,语言能够传达“形象”、“人物”、“事件”、“场面”、“幻境”等的存在足矣,具体到“形象”、“人物”、“事件”、“场面”、“幻境”的感知、体验,人们并不希冀语言包揽所有要素的具体化工作,他们只需要了解文学存在的元件和它们组合的进程与构想的可能即可。在作家创作过程中,作家对世界和情感、事件和矛盾、环境和变因等皆可大幅度地涉及,尽其最大的想象力创造最不可能存在的可能,并使作品的容量和篇幅以超乎想象的膨胀,最终都能够形诸于数字化的“具化”形态,它或者是图文并茂的纸质文本,或者是上传于网络上的、及时缀连了成千上万读者的随感评议的“连续性”电子超文本,或者是被影视媒体根据文字的构想和拟写进行情节复制或改造的具象化图像文本,还可以是被商家截取创意、转化为商标图案、玩具造型、Flash 视频、广告情境、MTV 背景的文学思想源物化活态文本。在这种种存在形式中,文学的概念被颠覆性地改写了,文字不再是陶醉于自我情感和想象的产物,也不再是囿于侍弄文字的狭小范围的精神对象化劳作,它是人面对世界的一种“表达权利”,一种特殊的思想和思维存在方式,一种可以自由畅游于各个领域,依然能够显示其独特的精神能量与审美有机性的生命存在。

文学的生命本体基于这样的观念形成其新的系统定位。在审视和理解这种新的本体观念及其系统的文学生命有机性时,我们警醒地意识到:新的文学本体更鲜明地体现了文学认知与存在视角的价值转换,它不再是古典式的“大一统”基因的逻

辑预设,也不再是脱离了历史与土壤的,基于基因颠覆的逻辑重构,它本质上是一次文学的生命与世界和人的生命的审美“合谋”:通过排斥“物”的机械性与僵化生命的保守与堕落,以及腐败生命的污浊与怪谬,它实现生命本体鲜活与无碍的自觉再创造。根据这种观念,文学更本质地内在于我们的生命和生命行为中,文学是我们在世界上得以激发活性资源和实现活性能量对象化的最佳方式。

那么,这样一种文学的本体规定性,或其根本的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一,文学生命本体成因的后续性导入。数字化时代的文学,将以往文学本体的先在预设转换为生产过程的后续性导入,不断地、动态地汲取促成文学生命发生整体变异的因素,从而使文学的生产,由过去创作主体的个体化劳动内在地转化为具有公共性的一种写作。数字化时代的文学,使作家的主体意识由自我意识向公共场域迁移,对于要表达的内容、怎样表达以及表达后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更多地从社会和“他者”相位来思考和取舍,从而所创作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最大限度地抹平了个人性情、性格特征,突出了自身作为一个拥有文学特殊思维和思想能量的人所能起的作用。作家张炜的小说《你在高原》以450万字的篇幅获得茅盾文学奖,作家称第一次动笔始于1989年,但真正开始写则是在93年之后,并且用了20多年才完成。在20多年间,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文化和知识背景,知识分子的心态,包括文学走向中暴露出的若干问题,都成为作家及时调整创作视角,导入新的文学资源的前提。张炜将这部“超级”长篇小说称为“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认为之所以选择写地质,“是因为地质的思维材料更结实,植物学、土壤学、岩石、动物、山脉、河流,现在的文学,虚幻的东西太多了”^[4]。有意识地将“更结实”的材料写入文学,用文学特有的体验青春和生命的笔法,把历史和人性贯穿其中,形成与当时虚幻文学时尚相对的文学本体观念,将它们用巨量化的文字现实地证现出来,从而凸显出文学主阵地计算机书写和阅读非常便利时代能够更完整地审视生命、品悟生命的优势,这是在数字化时代以前所根本难以实现的。

读者形成的张炜这部巨量小说为“已知中外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部纯文学著作”的认识,反映了文学本体观念认知的模糊。倘若是文学的思维和内容表达,即使是网络文学它也可以是所谓“纯

文学”的,而不是文学的思维,表达的也不是文学应有内容,那么,它即使运用了很娴熟的文学技巧,也不能算作“纯文学”,文学之“纯”与“不纯”,在数字化时代并无一个可以确切衡量的标准,关键是作家主体个人的文学本体认识是否纳入了文化与历史发展的轨道,将可以为人类提供精神参照和生命反省的因素吸收进了文学,如果作家能够做到这些,他的自我生命就与世界和发展中的人是在同一场域的,他把自身创作个性的独特性更适宜地与时代场域的背景、事件的变革关联了起来,从而促成了文学内在构成与生命有机性的完整改变,否则,作家的创作个性会成为疏导、表现生命活力的最大障碍,作家必不能够反映时代最敏感的、最迫切地需要通过文学加以反映或表现的内容,进而文学对于时代和社会所能产生的价值,也必不能够承担它理当能够承担的使命,相对于一个具体的创作者来说,他也将十分令人同情地陷入文学幻想自慰的境地。

其二,诗语言物化表现力的意义衰减。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在数字化时代诗语言的物化表现力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不那么重要”指诗语言在传统文学中具有“在场”呈现的绝对权力,因而其构成意义从文学存在的生命有机性来衡量,也是绝对根本的,应纳入本体推进过程的重要一链,但现在的文学却不是以文字表达和修饰的精美为首要来衡量的,你可以在写完作品后对文字进行充分的修饰,使作品的文字流畅、明快或幽默而富有趣味,但这都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就像有建筑就有石料、水泥,有公园就有花草树木一样,石料是打粉压制为特型的砖,还是雕镂为建筑中的景观,抑或那些花草树木由别处移来,或就地取材,都是第二位的问题,创作者考虑的根本问题是创作对象的整体存在的生命有机性问题,这种有机性是完全可以人为的,相对于文学来说,是完全可以虚构的,它们的生命存在体现在依赖语言方面,只是因为语言提供了生命寄居的平台,只要能够承载文学所要表现的对象和内容,这语言平台的华丽或朴素,巨幅或微量,都是次要的问题。因此,数字化时代最大限度地减轻了语言对文学创作的束缚,它将文学以语言为其生命的内核这一使文学背了近三千余年的包袱解脱下来,让生命进入自由舞蹈的境界。

熟谙文学理论的人必然会对降解诗语言呈现价值的观念,表现出不解甚至不满,他们会提出疑

问,如果将诗语言对文学的意义看得无足轻重,那么文学的想象如何展开,文学借助语言直接传达思想的特征和优势如何发挥,文学间接呈现人的心灵奥秘的独特品格如何确立,文学区别于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门类的话语权力何以存在,等等,这些问题看似都关切到文学的根本存在问题,其实文学的话语权力并不是由诗语言所赋予的,诗语言所形成的特殊美感效果恰恰是文学思维的一种表现,因此,降低诗语言呈现的地位和意义并不取消诗性的思维和话语权力,它在更广阔的境遇里可以尽展文学之优势。因而,文学不必因区别其他艺术,如音乐、舞蹈、绘画等而在语言上独树一帜,文学尽可以展己所长,将其他艺术门类的思维优势结合于自身,形成文学的视觉图像、音乐般的意趣和美感旋律、舞蹈的动态勾勒等等,但不论怎样汲取,文学依然是文学,文学不会取代艺术门类,其他艺术也不能达到文学的思维深度和广度。至于文学对心理世界的表现,文学对抽象的思想和情感的描摹、文学对形象和意境的想象和幻象,这些都可以得到保留,并不因为不把诗语言的呈现置于首要存在位便不再可以具有这些功能了,在新的本体观中,它对文学的本体设计既有可能性的逻辑推演,更多的是把文学放入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宽幅场域,让文学自在地生活于其中,而语言如果是文学生命要求它必当如此,它自然当采取合适的存在方式,或简或繁,或精或疏,不必再像以往那样精雕细琢,不必再因语言而肢解文学的其他生命构件,如果确实因语言不能够承担其他构件的分量,显示不出生命的整体存在,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在数字化时代进行辅助性实现,如图像呈现、音乐书写和设计标注等,在那时文学的生命有机性延伸在其他“物化”媒介里,依然拥有其生命本体的存在价值。倘若在新本体观念下完成的作品,要求必以纸质文本方式出版,则对语言的修饰要求相对要很高,但这恰说明文学在这种存在方式下生命有机性的一种完满实现方式,它不能理解为因为语言修饰得更完美了,所以作品的价值意义也相应被拔得更高。

其三,数字化文明的主体受孕。数字化文明即网络时代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区别的是,数字化文明聚合非物质化的劳动成果,并通过数字化生产方式将这些成果现实化,从而不仅拓开人类文明不可计量的虚拟空间,而且将这种空间纳入现实生活的控制系统,使物质与精神的生产和消费,都在前所未有的环境中实现和完

成。文学在数字化时代分享非物质化文明的创造特征,不仅使自身成为数字化生产与消费的重要对象和领域,而且还充分利用数字化文明改造自身的生成机制与存在方式。网络文学是数字化时代文学的代表形态,其突出特征是文学本体趋向文学关联因素的整体参与式转变。文学成长为新的受孕体,并诞生有新基因规范下的文学生产的新机制及其生命形态。

根据这种新机制,文学主体以增殖性受孕凸现内在体量的变异与更新,从而主体得以与数字化文明所表征的广泛领域产生关联,把各种含有情感、想象和意识能量的元素聚拢到文学场域中,形成数字化爆裂性生产的规模与形态。文学的主体受孕在传统文学中,往往通过某种情思和感悟所激发,把它们转化为可以咀嚼品味的文学情境和意象形态,再进一步用文字把这种感受巧妙地传达出来,在人的构思和意象的存在乃至客体化的文本形态之间,思想和情感的过滤,主体意图的强化和文字本身固有的塑造特性,并非一次性完成的,须经过多次转换后确定其精致方可面世,而在数字化时代文学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鉴赏品,它是生命体借助文学通道的一次交流,从而即便是文字、构思并不很成熟,作者也可以把它们上传于互联网上供读者阅读,读者懂得怎样穿越文字的瑕疵捡拾其内在的精华,并且不独是阅读中对作品进行消化,而且将他们的意见,有时是非常尖刻但准确的意见直接在网上传下来,这些留下意见的读者,往往代表着无数不同背景不同方向的读者,他们只要在回应,便表明作品的某一方面产生了其影响力,因此,文学在它向读者敞开自身时便开始了其具体存在的某种受孕,不论作者是顺应读者的看法,积极地汲取其建议加以改造的,还是逆向性地强化自认为能够带来观念和感受上更大张力的内容,总之,文学的具体存在打破了文学生命的封闭性与僵硬状态,它在与世界中的各种信息产生对流,这是网络文学生成过程非常主动并能够有效突破审美期待,使作品产生出异乎寻常的结果的一个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似乎有些作者并不情愿把自己的作品在还不成熟状态下拿到网络上让人们指点评说,人们有理由相信作者还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格局里,但数字化时代的文学要完成自身与整个世界的融合,必须让自身经历否定抽象、完满状态的变异与爆裂过程,否则信息的拥挤根本不可能给作者留下任何彰显自身的机会,于是在被动状态作家也要进

入数字化生产与消费的阵营。这其中有两个因素对他而言特别有意义,一是在自己认可情况下推向市场的作品,要经受广大受众的评估。数字化时代即使是很专业很权威的文学评奖,也要充分考量这方面的因素,广大读者的评估可能并不专业,但他们善于颠覆没有价值和没有意义的作品,如果确实是一部平庸的作品,它首先面临的是被广大受众清除出场的命运,当然也有个别情况,即在权威机构由专家们操控的情况下,把个别并没有达到很好的销量,在网络上也并没有形成反馈的声浪的作品推为精品,这并不要紧,因为专家仅仅代表专家对文学的评判视野,如果这种评判与文学发展的趋势、受众对文学的期待相吻合,那么权威机构的意见自会赢得普遍的响应,否则即使由权威机构颁发了“通行证”,它最终也走不出家门,因为数量繁富且总是处在变异与出新状态中的文学,会自动形成淘汰机制,让专家们的个别意见在非常狭小的范围赢取孤芳自赏的肯定。

由于数字化文明将没有边际的空间诉诸于文学的未来生产,使得文学的生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文学本体所要求的那些构件和元素,它可能更原始、更本真,更富有生命的冲动与能量,也可能更智慧、更人为化,但却借助呈现方式的泛化,能更

深入地为广大受众所接受和消费,而最主要的,文学的具体存在显得更趋个别化和类型化了,这种类型化和个别化仿佛是文体存在的标志,让人们能够更迅捷地找到相应的表达类型,从而以类型的细密化替代类型单一的机械化和僵硬化。同时,数字化时代的文学由于其无量无际无边界的生产和存在方式,使之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能借助貌似爆裂却内在地含有持续与还原,来使文学得到更为深远的延续,并不断激活文学的生命有机体,使之在体量繁富但却鲜活的存在中,获得生命本体的无限价值和意义。

引用文献:

- [1] 鲁迅. 鲁迅全集:第六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M. Burguete & L. Lam. Arts: a science matter[M]. Maria Burguete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1.
- [3]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4] 走近作家张炜:超级长篇是如何炼成的[EB/OL]. [2016-07-08]. http://archive.wenming.cn/zt/2010-06/13/content_20067328.htm.

(责任编辑:栗世来)

On the Organic Life of Literary Ontology

ZHAO Jian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Jiangsu China)

Abstract: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issue whether the life ontology of literature is the materialized form of literary existence or it is another life born under the materialized shell. The materialized form of literature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poetic language. In the pre-literary "infant period", the potential and the organic nature of poetry are implicitly collected. Without the "voice" of poetry, literature has nothing to rely upon. However, the poetic language is not the life of literature. Since the birth of the poem, images, emotions, events, pictures, bodies, etc. have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er with the help of language but tenaciously rejected the presence of language. The extremit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act that literature at the age of digitization has given little care to language, so what determines the foundation of literary life becomes the core issue of literatu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ontology of literature appears as a complete sequence of life presented in poetic language. Before and after the poetic language presents the mystery of the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poetry, and the life itself undergoes inherent variation along with the presentation of poetic language. The presence of words, ideas, divinations, images and the like vary inversely with the logical phase of the composition of literature, so that the literature in the digital age can ingeniously introduce the subsequent genesis of literature into a wide field of life, changing the way of poetic language bearing in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o stimulate the object. In this way, the complete life of the poetic language is also transformed from the gradual attenuation of the external materialized representation to the subject's congenial mutation and renewal.

Key words: literature; life ontology; poetic language; life mutation; field of life